

彻底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,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具重大意义的事。邓小平以身作则,毅然做出“全退”决定,堪称伟大之举。实际上,邓小平1984年夏季在北戴河自己的80岁寿宴上,就宣布自己将在中共十三大彻底退休,但结果直到1990年才真正退下来。

邓小平“全退”为何那么难



让老同志退休要得罪很多人

“文革”结束,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开始筹划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,并多次在军队系统强调干部年轻化的重要性。比如,1978年6月2日,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,邓小平讲道:“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,眼光要放得远一些。选好接班人,带好接班人。这件事做好了,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,见毛主席,见周总理。”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经济建设成为全国工作的重心,选拔年轻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变得更为急迫。鉴于这种形势,邓小平重申:“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,要从大处着眼,小道理服从大道理,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想不通了。”但“想不通”是自然的,有些老干部在“文革”中受迫害,靠边站了多年,刚刚复出工作,又要退位让贤,很难转过弯来;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,压不住阵脚;还有些老干部对“文革”中那些造反派整老干部还心有余悸,担心他们乘此机会重新起来翻腾。况且,领导干部职务还等同于名誉、地位、待遇等切实利益。在没有形成制度

的前提下,让所有老同志自觉退位,用邓小平的话说:确实是障碍重重。而这些老干部遍布中央和地方各省市,推行起来势必得罪很多人。

实际是个接班人问题

面对重重困难,邓小平本人多次表达带头退休的愿望。1981年7月,在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,他说:“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,我们老干部要开明,要带头。不开明可不行呀!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,老实说,就我们自己来说,现在叫我们退,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。当然,现在还不行。”之所以“现在还不行”,关键在于“退了之后谁上”还未确定,不把权力交接到恰当的人手中,谁也不会放心。中央顾问委员会就是以此为目的建立的。

1984年10月,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:“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……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。”也是从这一年开始,邓小平放风自己将在十三大全退,给全党做出表率。但邓小平退休,势必牵出两个问题:谁接总书记的班?谁填补邓小平、陈云留下的权力空白?

对于这两个问题,邓心中已有腹案:胡耀邦接替他,总书记从胡启立、乔石等年轻干部中挑选一位。据《胡耀邦传》透露,邓小平曾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。胡耀邦说:“我已年过七十了,十三大一定要下来。”邓小平说:“我、陈云、先念都全下,你要下就

半下,不再当总书记,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,到时候再说。”

“全退”变“半退”的背后

1986年10月,邓小平与李先念、陈云共同约定在1987年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,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,而且要一退到底,退出中央政治局、中央委员会。但变数丛生,1987年1月,胡耀邦因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”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,赵紫阳临时受命,主持中央工作。此时十三大召开在即,邓若全退,包括军委主席在内的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势必落到赵紫阳肩上。

由于核心领导层的新老交替意义重大,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对此很是慎重,王震在此前就曾为此专门咨询过聂荣臻。当时聂荣臻在沉思半晌后,回答王震说:“我认为,现在是过渡期,局面还不稳,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,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。他全退了,不当军委主席,一旦有事,怎么号令全军?只有他能镇得住,他在,军队就不会乱。”

十三大召开前夕,劝留邓小平的元老们集结起来,纷纷劝说邓小平。终于,邓小平收回“全退”的决定。中央正式作出决定,党的“十三大”上“四老全退,三老半退”,“四老”是指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邓颖超,“三老”则是指邓小平、陈云、李先念。邓小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,但仍担任军委主席,直到1990年初正式辞去这一职务。

(据《新闻午报》、《回忆父亲聂荣臻》)

邓小平与“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”



改革开放初期,邓小平就十分重视反腐败工作,对于典型案例,抓住不放,一抓到底。

1980年前后,广东海丰县走私贩私斗争处于高峰期,被有关方面查缴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。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经常跑到汕尾镇“视察”,把大量缉私物资,如当时十分稀缺的电视机、收录机等据为己有,同时大量索贿受贿,他家被戏称为“广播站的器材仓库”。王仲的行为影响非常恶劣。经法院认定,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、受贿索贿总额达6.9万多元。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。最终,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,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。该案也被称为“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”。

对于此类问题,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出,要“雷厉风行,抓住不放”。他还强调,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,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。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,而是大量的。“犯罪的严重情况,不是过去‘三反’、‘五反’那个时候能比的。那个时候,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‘小老虎’,一万元以上的是‘大老虎’,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‘老虎’……现在的大案子很多,性质都很恶劣。”他告诫全党,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,如果不坚决刹住这股风,党和国家就可能要“改变面貌”。

进入新时期,为什么反腐败形势变得严峻?邓小平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:一是思想问题,即少数干部抱着“当官做老爷”的心态,丢掉了我们党艰苦朴素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;二是制度问题,即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不够健全,同时法制不够完备。在邓小平看来,思想问题固然不可忽视,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稳定性、长期性。因此,邓小平一再强调,反腐败要常抓不懈,要建立制度,标本兼治,确保改革开放顺利发展。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邓小平没上过军事院校 为何能指挥千军万马



读书作为邓小平的一个爱好并不广为人知,他在南方谈话时说:“我读的书并不多,就是一条,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。”让人们误以为,邓小平是个不怎么读书的人。其实,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,并且博览群书。

邓小平是个金庸迷

邓小平读书的爱好不为人们所知,一个原因恐怕和他的读书习惯有关。邓小平从不做读书笔记,很少评点所读的作品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,邓小平看书“从来不在上面写字,连个道都不画,熟记在心,融会贯通。不是那种记啊画啊的人,一切都

是在脑子里,一种精神的领悟。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。”所以邓小平的读书习惯,非他身边人不能知道。

邓小平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呢?人们会说金庸的武侠小说。确实,邓小平是个金庸迷,但他读武侠只是偶尔作为消遣,放松紧张工作的头脑。他说: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,下次还可以再看,根本不过脑子。

实际上,邓小平看的书很多,远不止武侠小说,真正是博览群书。他生前用过的书房有40多平方米,大半屋子堆着的都是曾经阅读过的书籍,囊括天文地理,古今中外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:“我们家的藏书,什么都有。中国历史方面的,中国文学方面的,外国文学方面的,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、回忆录、传记、哲学等方面的书。当然,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。”

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

各种工具书是邓小平常翻的。他很喜欢看历史地理方面的图书,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,一本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地图集》,一本是《世界地图》,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。据邓榕回忆,邓小平还爱看字典辞典,常看的有《中国古今地名》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。家里的《辞海》是中华书局1947年的版本,已被他翻得很旧了,折损的硬纸壳书皮是用订书钉固定住的。

中国古典史书是邓小平情有独钟的。卓琳回忆邓小平有“三爱”,其中之一就是爱看中国历史经典书籍。在历史古籍中,他最喜欢读的是《资治通鉴》,“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”。他还通读了二十四史,特别爱看《三国志》。

邓小平还喜欢外国人物传记,看得非常多。主要是跟“二战”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,比如前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。邓小平的老部下张震回忆说:“小平同志特别聪明,他从来没上过军事院校,但是却能指挥千军万马。”其实,这也与邓小平读的书有关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上过军事课程,在苏联名将的指导下学习了军事理论,必然也读过军事类著作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